

朱培德传

陈红民 肖如平 郭代习 刘丰祥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培德传/陈红民等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006-7496-2

I.朱… II.陈… III.朱培德-传记 IV.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9301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编: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4034345 营销中心电话:(010)64030540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1/32 12.5印张 2插页 300千字

2007年6月北京第1版 2007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序 言

我在大学里开设了一门“中国现代人物研究”的课程,选择不同类型的人物,分析其在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指出各类人物的不同特点与研究他们所需特别关注的地方。所选类型中,有一类是现代中国的军人。

在传统社会里,军队是统治者取得政权与维持政权的工具,只效忠于帝王个人。改朝换代、拓展疆域与维系家族统治完全依赖于军队的强大与否,军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精辟地概括出军队与王权政治的关系。一部人类的古代历史,也能充分佐证孙子的论断。然而,传统社会里的军人多是被迫服役的,他们背井离乡,或戍边,或征战,地位相当低,生命无保障,随时都会丧身疆场,“一将功成万骨枯”,故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谚。

伴随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军队的功能有了重要变化,在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国家中,军队效忠于国家(宪法),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其主要的功能是维护国家安全,在国家危难时负有保民卫国的职责。军事力量(集团)完全受制于宪法,职业军队领导服从于民选政府。军人只是一种职业,服役是公民对国家尽责。

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近代中国,各种矛盾交织,冲突不断,统治者的权威丧失,传统社会的调节功能紊乱,现代的制度尚在发育之中。武装斗争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军事力量(集团)的地位骤然上升,逐渐地脱离了各种控制,而成为控制国家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间社会的顺口溜“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是不同阶层对当时情势的总结。放眼中国近代史,绝大多数的争端均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解决,而那些看似“和平解决”的背后,莫不是武力起着根本作用。因此,军阀的崛起便成了近代历史的一个显著标志。1912年中国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后,政府不仅没有控制军事力量(集团),反而被军事力量(集团)所控制,出现了一个军人主导国家的“军阀时代”——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穷兵黩武,互相争夺,轮流把持中央政权。在1912~1928年的北京政府(北洋政府)时期,政府首脑更换了53人(次),平均四个月就有一次“倒阁”,政局不稳可见一斑。担任政府主要职位的,不是军人,就是军人的代表。而在地方,也涌现出许多以省为割据主体的军阀派系。军阀征战造成了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生产力惨遭破坏的恶果,严重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因为中国近代军事力量(集团)的崛起,使得军人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不仅大的军事集团首领(军阀)可以当总统、国务总理、督军、省长,中级军官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就是下级军官也能鱼肉乡里,衣食无虞。在剧烈动荡、百业凋零的社会里,军人成了最炙手可热的职业,“当兵吃粮”,可以保证个人温饱,还可以通过战场立功来晋升军官,改变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如冯

玉祥的父亲就因家贫入淮军，充下级军官，冯玉祥则在 15 岁就投军，从士兵开始，最后成为西北军的首领，叱咤风云。曹锟早年下乡贩布，经营失败后投军，逐级升迁，成了直系军阀头目，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原籍山东的张宗昌家贫而被迫闯关东，仍生活无着，沦为胡匪，投军后发达，成了“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老婆”的“三不知将军”。王俯民所著《民国军人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收入北京政府时期正规军师长、重要混成旅旅长以上的军官履历，细察他们的身世，因家贫而入伍、因升官而显贵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成功的效应，自然吸引许多生活无着的青年人去投军。

1925 年，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建立，军队受制于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这种仿效苏联军事力量（集团）与动员型政党或文官政府的体制是相当先进的。国民革命军中设立党代表，中下级军官多受正规军校的训练，黄埔军校的学生不仅学习军事科目，也要学习三民主义等政治课程。1928 年国民党依靠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者，其统辖的军事力量号称“国军”。关于国民政府时期军事力量（集团）的地位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田玄新近完成的长达五十余万言的博士学位论文《转型社会权力重构中的国民政府军人角色研究（1927～1949）》（2005 年，南京大学），明确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军人政权”、“军人干政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结构是军事威权的独裁政治结构。由军事威权结构的内在规定性所使然，其必然缺乏基本的竞争和参与机制，其政府控制与渗透能力必然低下。又由于军人政权的内在规定性，其必然形成一种中国式的军人统治风格”。田

博士的论点是一种极端,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笔者也不敢苟同。然而,田博士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再证诸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的军人背景,其行事方式的军人风格,军事将领们占据政府要津、地方实力派在各地独霸一方等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南京国民政府的确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军人在政府中拥有支配性的特权。

其实,军人在国家(地区)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也相当普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各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中。军人干政甚至军人政权不断出现大致上与这些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出现脱序有关。军人成为某些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西方学术界,军人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军人干政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有相当多卓越的研究成果,如安德烈斯基(Stanislav Anderski)的《军事组织与社会》(*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1954年)、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军人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1957年)、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的《专业军人》(*The Professional Soldier*)(1962年)、阿布拉罕森(Bengt Abrahamson)的《军事专业化与政治权力》(*Military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1972年)、小威尔奇(Claude E. Welch, Jr.)与史密斯(Arthur K. Smith)的《军人角色和军事统治》(*Military Role and Rule*)(1977年)、诺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的《政治中的军人:军事政变和政府》(*Soldier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 and Government*)(1977年)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切入军人在国家(尤其是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角色这一命题。

可惜的是,这些成功的研究范式,基本上没有被引入关于中国近代军事力量(集团)的研究中,或许,中国的情况极其复杂,任何一种理论框架都无法容纳。相对于繁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关于这一时期军事问题与军人角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可以列举于此的包括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1930年)、刘馥的《中国现代军事史(1924~1949)》(1956年)、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1978年)、陈志让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文版,1980年)、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1987年)、齐锡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文版,1991年)、刘凤翰的《中国军事史》、张瑞德的《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1993年)等。此外,关于民国时期重要军事人物如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传记也有许多版本。这些著作各有其贡献,但多数是过程的描述、事实的分析,具体而微,缺乏宏观的考察及高屋建瓴的分析。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民国时期,中国军人的角色有多大的变化。换言之,中国军队中有没有出现现代化的因素,中国军人有没有向现代职业军人转变的趋向?从总体上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些难度,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会有许多反面的事例。从个案研究入手或许是可行的。从朱培德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的答案是,至少在他身上,已经表现出向现代职业军人转变的趋势。

朱培德在清朝末年从军,身上有许多传统军人痕迹,他是讲武堂出身,靠着战功与讲武堂师长的提携渐渐地成为滇军的领袖之一,滇军成为他立身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与当时把军

权看成自己命根子的军阀不同，他对军队的控制相对较松，没有强化下级军官对他的个人忠诚，虽然他也抓住机遇扩军，但当国民党（国民政府）收束军权时，如1925年编成国民革命军、1929年编遣等，他都服从命令。可能会有人将此与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与蒋的关系是后来建立起来的，他对蒋的服从，更多的是把蒋当成是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象征，如同他早期服从孙中山一样。朱主动地放弃了军权和割据一方的可能，这在当时是较为少见的例子。到中央后，他也只愿从事幕僚工作，晚年他信奉出世的佛教，有超脱现实的念头。朱培德有着较强的国家观念，促使他入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感于国家败落，要强国以雪外侮之耻。他后来对各种内战没有兴趣，总觉得是伤国家元气，而致力于对外御侮的战争准备。当然，在那个各派力量为争夺国家政权打得不可开交的年代，谁代表国家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得到一般国际承认的政府是国家象征这一点来进行论述。朱培德的这种不同之处，代表了民国时期已经有少数的军人意识到服从国家的重要性，具备了转变为现代职业军人的萌芽。我曾经将此一想法就教于台湾的前辈学者蒋永敬教授，得到他的称许。

研究历史的学者，总会强调客观与公允。然而，历史研究总是与历史的真实有差距的，历史研究似乎是一个有选择的镜子，它所反映的是经过筛选有些失真的历史。首先，“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叙述往往涉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控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当权者，总会直接间接地将其引向对自己有利的轨道。其次，由于职业的关系，军人较少留下文字的记载，而军事战略、作战计划又都是机密，这给后世主要靠文字档案为

基础的史学研究造成了困难。以军人与同样是在近代新崛起的另一个群体——近代知识分子相比,就一目了然了。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兵痞等也在创造历史。而且在一个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影响社会的方式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用宣传、教化,即所谓“笔杆子”;军人用武器,即所谓“枪杆子”。“笔杆子”是软性的、长效的,即使最激烈的文字,在现实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枪杆子”则是刚性的、直接的,枪声作响处,人头落地,山河变色。当年,《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也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更谈不上能理解了。而军阀的举动,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可是在今天的历史记载中,《新青年》被一再强化,加上了无数光环,而军阀的印记除了被夸张成漫画式的无知笑料外,其余都淡化了,成了过眼云烟。这里面就有军人留存资料不足的问题。以本书的传主朱培德为例,他文化程度并不高,又是在抗日战争前去世,留下的个人资料非常少,对他的研究更少。逝世不到70年,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将军了!以致当他在南京的墓葬迁移时,地方政府竟然需要找民国史的专家来认证其身份。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搜集资料异常困难。作者去美国访问朱培德的后人,去云南、江西及南京的档案馆查阅。所幸,台湾方面新近开放了原视为极机密的蒋介石档案,我们专程前往查阅,收获不菲,在本书中较多地引用。虽然我们已经尽力,属于朱培德个人的资料(书信、日记、文章等)仍然稀缺,真是莫大的

遗憾,也多少会影响本书的立论。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赐教。

将朱培德视作转型时期中国军人的一种代表,为其立传,并试图以此推动民国军事史、军事人物的研究,这是我们的初衷。成功与否,当由读者评论。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高材生	1
一、青少年时代	1
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习生活	4
三、加入同盟会	8
四、参加云南辛亥重九起义	12
第二章 崭露头角	19
一、龙潭战役中锋芒初露	19
二、第二次讨龙战役的主力军	28
三、驻粤滇军领导权之争	33
四、反对唐继尧二次回滇	41
五、北伐与讨陈建功	44
六、维持护法根据地	51
七、二次北伐的艰难曲折	60
八、参与镇压杨刘叛乱	64
第三章 跻身权力核心	68
一、整编第三军	68
二、北讨熊克武，南征邓本殷	77

三、反蒋与附蒋·····	84
第四章 北伐建功 ·····	94
一、整军出发·····	94
二、出兵江西·····	101
三、万寿宫大捷·····	109
四、两攻南昌·····	115
第五章 宁汉之间 ·····	124
一、为蒋所困·····	124
二、靠拢武汉·····	133
三、遣送共产党人出赣·····	142
四、遭遇八一南昌起义·····	158
五、调停宁汉·····	170
第六章 主赣困局 ·····	177
一、统一政令·····	177
二、北伐奉张·····	185
三、“围剿”红军·····	195
四、艰难建设·····	204
第七章 裁兵编遣，出师讨桂 ·····	217
一、裁兵编遣敢为先·····	217
二、出师讨桂勇当前·····	230
第八章 入襄枢政，辅佐蒋介石 ·····	243
一、助蒋讨冯·····	243
二、再战中原·····	250
三、宁粤之间·····	259
四、从避战到迎战·····	268

五、参与国防建设	284
第九章 调停两广,讨伐张杨	313
一、调停两广事变	313
二、西安事变,力主讨伐张杨	324
三、参与审判张学良	332
第十章 辞世	341
一、日常生活与家庭	341
二、辞世与国葬	350
附录一 朱培德活动年表	358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371
后记	378

第一章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高材生

一、青少年时代

朱培德，字益之，云南盐兴县元永井（现禄丰县黑盐井矿区）人。^① 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生。元永井是云南著名的产盐区之一。朱培德的先祖是江南人，朱氏家族在云南的第一位祖宗是朱奉起，他是明代成祖时的一位将领，世居当时的上元县（今江苏省江宁县）柳树湾。他在永乐年间奉调云南为总兵，就举家离开柳树湾，率兵经古黔道入滇。后人定居在安宁及禄丰地区，历代多务农，间或入仕，祖墓散布在今安宁县郊外（洛阳山及温泉两地）及禄丰城外。民国时代的禄丰祖墓地仍存有朱氏家祠，供有历代祖先牌位，现已被毁。朱培德的曾祖父朱文华携家迁居元永井，参与开发盐业，是投资的灶户之一。其祖父是安宁县一位较知名的“学者”，他不愿意搞盐务，就遣长子朱秉堃去办理。朱家移滇后的第十一代为振家风，确定以“秉德维贤，以光宗祖”为第十二代起的后人辈名：秉、德、维、

^① 盐兴，旧县名，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1913年以清末黑盐井、琅井两提举司辖地设县。1958年撤销，并入广通县。1960年广通县撤销，并入禄丰县。朱培德在入云南讲武堂时，自书籍贯“云南楚雄府黑盐井”。

贤、以、光、宗、祖。朱培德的父亲朱秉堃即第十二代，住民国时代所称的盐兴县内的猴盐井，他是盐兴县广通书院的山长，同时经营盐业贸易。妻何氏是黑盐井人。两人共生育子女四人：长子润德，次子培德，三子树德，幼女淑德。^①

朱培德小时非常聪慧，4岁便开始在祖父的指导下接受识字启蒙教育，进步很快，显示出很强的接受能力，深得长辈的钟爱。朱培德5岁的时候，由祖母带到条件更好的安宁读书。7岁时，他年仅30岁的父亲朱秉堃不幸去世，他跟随母亲一起生活，并在这一年由祖母送入私塾就读。他不但书读得好，常常语出惊人，且“喜骑竹马，弄技击”，^②颇有军人的天赋。朱培德的母亲青年守寡，育养幼小子女，忍抗当时族人侵占压力，艰苦勉维盐业，终保小康。朱培德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一生孝顺。

朱培德七八岁时，有一天从镇外私塾经一荒野小径回家，突见路旁约十几尺外的草叶前伏着一只斑斓大虎，睁着眼盯住他，并向前慢爬。刚开始他非常惊恐，但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他反而镇静下来，急思求生之道。“他想如恐慌地转身逃跑必定引它追捕，绝无法可逃。于是就赶快抛弃惧意，壮着气睁大两眼回瞪它，想不到此虎竟停止爬动”，双方如是相持，朱慢慢地以小步向后退，两眼继续瞪着老虎，想不到虎也开始向后退，人虎之间的距离逐渐增远。不一会，老虎竟退入草中，但颈还露在草外。此时朱发现身后地上有一块大石头，就慢慢地蹲下，捡起石头拿稳后，大喊一声尽力向虎扔去。老虎掉颈跑开，朱培德也转身飞逃，进入镇内才敢停，周身颤抖不已。当晚，受惊吓的朱培德噩

① 朱维亮：《朱维亮回忆家世》（未刊稿）。朱维亮系朱培德长子，现居美国。

② 秦孝仪：“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见《革命人物志》，第17集，（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50页。

梦连连，被惊醒了几次，大人整夜守在床边安抚。^①

朱培德的祖籍地安宁与出生地盐兴，清末时曾留下反清义军的足迹。同治五年（1866年），大理义军曾过此与清兵作战。而盐业丰厚的利润，更为各方所觊觎，“所需兵饷，即由各营自行抽课”，盐民负担颇重。这样的环境，对朱影响颇深。

朱培德稍长，在书报上读到列强侵略中国的报道，很觉气愤。有一次，他从报上看到照片上的外国人都穿着窄长裤子，伸直腰腿硬邦邦地站着，就以为洋人的腿无膝盖关节，不能弯曲，就天真地想出了打洋兵的“必胜之术”：中国兵应占领山头，居高临下朝下枪击，洋兵是“直腿”不能爬山，只有在山下挨打，终被打败。他用小炭块在家中灶壁上画出这场景，为此被母亲责骂一顿。

到了十二三岁，朱培德的身体结实起来，他在读书学习接受旧式文化教育的同时，更加热衷于舞刀弄枪，骑马射箭，从小就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果敢的精神。他常与兄弟及邻居儿童组织打仗游戏，分成“中国”和“洋人”军队，两队用木杆当枪作战。他总是指挥“中国军”据山坡高处，而且总能打败“洋人”。

朱培德后来考入县内新设的中学堂，留日云南学生办的杂志《云南》当时已经传到朱所在的学校，他开始接触到了反清的革命思想，还参加过向英法力争七府矿权的学潮。他最喜欢的课程是国文（特别是《史记》与唐宋的诗词、散文）、数学及物理等，17岁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那时，他也经常协助家里打理盐业经营的事，主要在文书与财务方面。

朱培德在十三四岁时就向母亲表示将来要从军救国，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当他18岁时，从军意志更为坚决，母亲只好

^① 《朱维亮回忆家世》（未刊稿）。

忍痛让他去昆明的陆军随营学堂入伍受训。^①

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习生活

清王朝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已经是衰象日显,在列强的一次次打击下,割地、赔款,被迫出卖国家主权,中华民族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老大帝国中国竟然被东瀛“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清政府打着“自强新政”的旗号开展“洋务运动”的成果——北洋海军也几乎损失殆尽;中国不但又要大量赔款,而且还被迫割让宝岛台湾!中国面临“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许多仁人志士在寻找着救亡图存的道路,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志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次次发动武装起义,沉重打击着清王朝的统治。面对全国揭竿而起的形势,清王朝感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预防革命的发生,清王朝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变化进行一些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在全国建立新式陆军。与之相配套,清政府设立了一些新式的军事学堂,如讲武堂、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程兵学堂等,以培养新式军事人才。

20 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军 36 个镇(师)。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编练新军又有着特殊的意义。清末的云南,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政局不稳。云南同当时法国占领的安南(今越南)以及英国的殖民地缅甸接壤,英法觊觎云南的领土已久。英国早在 1877 年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滇省边界与缅甸地方来往通商章程》。1911 年,侵驻缅甸的英国军队武力占

^① 《朱维亮回忆家世》(未刊稿)。